

# 唐鸿胪井碑理应归还中国

段 勇

文明瑰宝的跨境流失，从来不是孤立的历史偶然，而是近代以来战乱频仍、殖民扩张裹挟下的时代悲剧。回望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之际，文脉亦遭重创。在众多流失文物中，唐鸿胪井碑的命运尤为典型。

唐鸿胪井碑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是盛唐王朝派遣特使崔忻册封东北地方首领大祚荣、正式确立该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直接历史物证。碑文虽简，意涵深远：“敕持节宣劳勋勗使鸿胪卿崔忻井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寥寥数语，定格了盛唐的邦交盛典与边疆安宁。此外，碑身之上还留存着明清官员、学者览碑凭吊的题刻7则，历代文人的追思与感慨层层叠加，让这块石碑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载体。至光绪年间，为守护这份珍贵遗产，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专程带人增建石亭予以庇护，是为唐碑亭。此碑体量恢宏，素有“其大如驼”的说法，据日本海军省档案《唐碑略图》附记及日本学者渡边的实地测量数据：整碑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量约达9.5吨。碑大如驼，巍然屹立于旅顺黄金山北麓，面朝渤海，背倚山河，默默守望千年时光。

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有着坚实的文献与影像佐证。《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辽东志》《大明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史志文书，对崔忻出使册封渤海、唐鸿胪井的开凿及立石碑刻有着明确记载，史料相互印证，勾勒出完整的历史脉络。更可贵的是，在唐鸿胪井碑于旅顺原址留存期间，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镜头之下，石碑的形制、唐碑亭的风貌清晰可辨，为今日追溯其历史原貌、佐证其文明价值提供了直

观的视觉史料。

然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方承载千年文脉的石碑难逃厄运。其流失背后，正是日本自1894年起蓄意实施的文物掠夺计划。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不幸沦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只得无奈宣布“局外中立”。日军取胜后，随即占领旅顺等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并迅速启动新一轮文物“搜集”，而唐鸿胪井碑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重点觊觎的目标。日本学者酒寄雅志在《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中明确记载，1905年7月，日本官方“大概是通过外务省由海军秘密委托内藤对旅顺唐鸿胪井碑进行鉴定，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将碑石搬到日本的契机”。此处的“内藤”，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他1907年关于渤海历史的演讲中，也曾公开披露“当时去渤海的使者的事迹最近在旅顺发现”，间接印证了日本对这一文物的蓄意探查与图谋。

掠夺，最终以“搬运”之名实施。1908年4月，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致侍从武官长的报告所附《唐碑亭记》，清晰还原了这起掠夺的全过程：“唐碑亭由碑和石亭构成，位于旅顺黄金山北麓港口以东数百步处……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我军占领旅顺后……此唐碑亭被搬迁到东京，现在宫城内。”1923年日本印制的《宫城写真帖》收录的照片中，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被公然置于专门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侧面，亭柱上清晰可见的断痕，仿佛无声地诉说着它被暴力切割、强制搬运的惨痛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



▲20世纪初，关重忠拍摄的在旅顺原址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

◆日本宫内厅公布的唐鸿胪井碑在建安府的近景照片。

图片均为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提供

令部对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造，唐鸿胪井碑在日本的法律身份被扭曲界定为所谓“国有”。但这一单方面的法律认定，无法改变、更不可能抹去其作为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的本质。

唐鸿胪井碑镌刻着中国古代王朝册封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厚重历史，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定位，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标准高度契合：它精准匹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中“有关历史……以及有关国家重大事件的财产”的核心界定，同时也完全符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对于请求国具有特殊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关键要求。唐鸿胪井碑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分量最重的“流失国宝”之一。

值得重申的是，日俄两国在中国制造战火、角逐利益，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彼时的清政府被迫宣布“局外中立”，并非交战方，而唐鸿胪井碑作为中国固有文物，与战败的俄国毫无关联，日本根本没有任何正当借口将其当作所谓“战利品”肆意掠夺，更应该受到谴责。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

金银器中的『诗』与『事』

齐 东 方

## 博古知今

石器代表着人类对工具的加工使用；陶器将泥土通过水与火，第一次合成了新物质；铜器、铁器为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带来曙光。相比较而言，金银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贡献不强，然而金银以其稀有难得、绚丽灿烂的自然魅力，带着一种生命的灵性，始终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起着微妙作用，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黄金，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状态存在，可以直接获得。银在自然界中主要呈化合物状态，需掌握提炼技术。金银及其器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货币、赋税、贡奉等多种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波及语言词汇，如“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一刻千金”“惜墨如金”……可以说，黄金、白银用天赋的色彩描写了生活的诗、历史的事，成为古代社会文化的微观镜像。

用于装饰，大约是黄金最初的功能。与夏代同时段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环、银环，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首饰。到了商代，很多遗址和墓葬中发现金箔、金片、金叶、金丝，大多是黏附在棺椁、漆器、车马具上的饰品。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发现的黄金面具、纯金皮包卷的杖、鸟鸟绕日金饰件，有强烈的祭祀和崇拜意义。从制造技术上看，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金片极薄，厚度仅 $0.01\pm 0.001$ 毫米，经过退火处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金面具等，采用了锤揉、剪切、刻划等多种手法，表明当时工匠对黄金的性能已很熟悉。

容器的出现是金银器发展中划时代的标志。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杯和器盖，形体大，花纹精细而复杂。春秋战国时，金银错、鎏金已是常用技术。进入汉代，金银器制造摆脱了主要作为附属装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金银器皿数量、种类增多，有盘、匜、碗、盒、盒、壶等，还有金灶模型、金缕玉衣、金饼、金印、金章、各种首飾。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刘胜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的金银器，是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外来的输入品增多。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厥的银盘、北魏城址的银长杯和银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的鎏金银盒，广东遂溪南朝窖藏的银碗等，都来自西亚或中亚。外来器物为中国金银器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唐时宫廷的奢华风格和官营管理成就了金银器的一个高峰，在陕西西安李静训墓、西安南郊何家村、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及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等都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出土，其造型、纹样常被其他材质的器物借鉴，引领时代风尚。

宋代以后，由于金银器原材料更加充足，器物产量增加，商品化和平民化倾向渐浓，批量生产使模式化、成套的器物纷纷出现。产品以崭新的风貌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加华丽、精细，一个是趋于素朴、简洁。前者服务于贵族豪富，后者满足普罗大众。宋元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发生明显改变，普通的碗、盏、杯、碟、盘、盒、瓶各有不同样式。有些器皿造型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纯洁、桃子象征长寿、梅兰竹菊象征君子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韵味，这是中国民俗艺术史上的新现象。

士大夫的审美影响了高档金银器产品的制造，诗情画意的场景、闲情雅致的意蕴经常体现在器物装饰图像上，并题有诗句，融诗书画为一体。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又是一个重要现象，通常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不仅有鼎、簋类的造型，还施有云纹、霞纹、饕餮纹等，精巧别致，古色古香。

明清金银器的用途更为广泛，渗透到宗庙建筑、宫廷装饰、冠服首饰、文房用具等方面，器物无固定模式，很多向纯艺术性、观赏性方向发展。明清金银器制作不仅更加精细，还常常与镶嵌工艺相结合，各种宝石镶嵌使器物更为奢华，还有以金掐丝填烧珠琅的新工艺出现。累丝工艺的作品堪称金银细工一绝，具有织物般柔软华丽的质感，显示出对金银材料特性更深刻的理解。

金银器质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观上的绚丽，使人们用物质材料表达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丰富，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的信仰、礼仪、等级、技术、艺术、时尚、理想及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貌与变迁。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传承之光

### 巧手补书叶 灵心理万卷

金 路



故宫博物院古籍保护科技实验室的修复师正在溜书口。金路供图

古籍类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故宫博物院195万余件各类文物中，有古籍和雕版60万余件。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便设立了图书馆，将紫禁城内各处的图书典籍集中收藏在寿安宫。2008年，故宫博物院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25年，获批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至今，古籍文物中已有四批共计180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23年，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共同启动了“古籍保护与活化公益项目”，两年来顺利完成了大藏经雕版的抢救性迁移和熏蒸等预防性保护。项目支持下，故宫博物院专设雕版馆，馆内常设“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库房陈列展出文物1.5万余件（组），展示着当年大规模印刷活动的痕迹。联合搭建的古籍保护科技实验室，修复了部分古籍，涉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嘉兴藏》、蒙古文《时宪书》等，首次整理研究、数字化采集、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五朝《钦定宫中现行则例》。

古籍修复前都要“望闻问切”。有关纸张、丝织品检测，要用显微镜观察，分析纤维形态特征，判断其材质，为修复方案的制定和修补材料的选择提供依据。蒙古文《时宪书》的装潢封面是以特殊花卉为纹理，以丝织品黄绫为材料，修复师先

请相关机构用真丝定制特殊花卉花纹的白绫，再与纺织品材质分析人员商讨用植物染料仿制颜色的方案，每次单独将白绫染出最为接近原书的成色，才用于修复。

修补书叶，更需“对症下药”。比如对于污渍，要用温水喷洗、自然阴干；对于开裂，要先对栏对字，再溜书口；对于局部破损，则应喷水、展平才能修补；对于四周老化、酥脆、缺损，需先修补再用皮纸局部加固；若严重破损，必须溜书口再修补，最后整张托裱。千疮百孔的一张筒子叶，仅仅修补重度虫蛀，就需要数天工作。通过修复师的一双巧手，一张几乎失去80%的封面，经过去污、展平、配纸、修补、托裱等几个工序，才能恢复为清晰的页面，还要完成齐栏、纸捻加固、打眼、上封面、订线等步骤，修复工作才算圆满。

实验室中还有大量来自图书馆的保管和研究人员。在系统整理库房文物时，

他们发现，除内容丰富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涵盖抄本、刻本等古籍54种251册，木刻雕版541块。针对不同版本的目录卷数和内容，他们结合人工对比与电子图像对比，每人一本，逐页核对。通过对档案文献中多朝领用物料、报销费用、请修和告成档案的细致总结，在刊印刻本中梳理出黄绫、石膏绢、蓝布刻本三种不同书函、书衣用材形制。弥足珍贵的是，书内夹带的黄条尚保存了存放地点的关键信息。相关文物呈现出多种形式并存、多朝版本连续、装潢材料丰富、文物与相关档案文献高度对应等特点，充分展现了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籍、雕版的独特之处。

数字化采集与出版同样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在数字化采集影像前，修复师需要对轻微伤况的古籍进行加固等预防性保护，伤况严重的则需要全面修复。很多古籍纸张轻薄脆弱，为了保证扫描效果，专业文物采集人员需小心翼翼地在薄薄的筒子叶间进行衬纸。本次《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以清嘉庆至光绪五朝版本为底本进行高清扫描，同时推出普及本与再造本，满足学者与收藏者的差异化需求，部分古籍影像资源准备在故宫博物院官网“数字文物库”板块上线。

故宫博物院古籍保护科技实验室的建立与相关工作，特色鲜明、意义深远，将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大观长江”主题展展出的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出土木刺。

### 我家门口有文物”征稿启事

提起文物，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博物馆里那些精美器物、国宝华光。近年来，随着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尤其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很多人惊喜地发现：原来文物离我们那么近，甚至就一直默默地陪在自己身边。它可能是村头的一口井、跨溪的一座桥，也可能是街边的一块石碑、公园里的一座亭台、闹市里的一片老厂房……

由此，本版现推出“我家门口有文物”专栏，欢迎大家来稿，讲述您与文物之间的动人故事，文物等级、类型不限，篇幅1000字左右。期待您的文字，唤醒街巷尘封的记忆，让“家门口”的历史文脉，不仅滋养我们的精神，也成为心灵上温暖的陪伴。



▲“大观长江”主题展展出的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出土木刺。

## 古今情愫 大观长江

陈曾路

众对长江文明、生态、未来的多维思考。

展览的题眼“大观长江”，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清代《长江大观全图》，以版本而言并非十分珍贵的善本，绘画功力和画面呈现当然更不能与名手巨擘的《长江万里图》相媲美。但它记录了从镇江府沿江而上，经瓜洲城、扬州府城、池州府、安庆府、九江府等直至洞庭湖口与荆河口为止的两岸山川景致与名胜古迹，如金山、栖霞山、龟山、晴川阁、黄鹤楼、鹦鹉洲等。最有意思的是，图中还以文字注记长江景观传说的来源、长江行船的各段水程、沿江物种的多寡、江中行船的技巧等。如记“袁矶”不但标注有“三国刘备孙吴夫人庙”，还有“此处大船停泊避西北风”。户部报税要开清白。工部抽船并竹木之类。船往河内，春夏提防山水涨发，慎之”这样的攻略。在山水地名中不时出现“李白举杯问月处”“陶渊明在此作县令”这样的惊喜，实实在在地给了人们一个“长江大观”。细想来，《长江大观全图》体现的是清代一般人对这条大江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本身就是地理、自然、历史的综合呈现。

展览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部分。“起·溯源”，带我们回到文明的源头。从张家港东山村这个“长江第一村”，到马家浜、崧泽、良渚，再到公元前5世纪激烈的吴越争霸，特别是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刻纹骨版及吴王夫差剑等珍贵文物，让我们直观感受到长江中下游文明的源远流长与独特气质。

“承·烟火”，聚焦于文明的烟火气。从江南的

上新了

繁华到巴蜀的市井喧嚣，长江以其丰饶的物产与通达的水系，滋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孕育了艺术家的创作。历代诗人的吟诵，夏圭、赵芾、王蒙、戴进、吴伟、王翚等绘画大家的《长江万里图》、《京口送别图》、《三峡瞿塘图册》、《黄鹤楼图》、《岳阳楼图》、《话说长江》这样的经典图像和影像记录，共同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的长江民生画卷。

“转·激荡”，聚焦于长江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与重大变革，如爆发于江畔的柏举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行政区划变迁和王朝更迭……从古代中国到近代巨变，长江以其奔涌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在挑战中蜕变，在激流中新生。大江是天堑，亦是通途。长江在一次次文明的碰撞、融合与挑战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韧性所在。

“合·共生”，是展览的高潮。展现长江中动物形象的鼈龙纹铜镜、再现江边生产活动的盐场画像砖、东吴镇守江陵的名将朱然墓出土的木刺、从长江出水的《瘗鹤铭》拓片、镇江丁卯桥出土的反映繁忙漕运的金银器、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狮纹碑、明代航海家洪保的墓志铭等来自15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讲述长江如何作为一条纽带，连接南北、沟通古今，推动中华文明“和合共生”。

有道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讲好这大江的故事，是博物馆人的职责。

（作者为吴文化博物馆馆长、“大观长江”主题展策展人）